我们太容易满足于把辜鸿铭仅仅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了。

他至死留着辨子，他在国外的公共汽车上倒着读英文报纸，他把男人比做茶壶把女人比做茶碗，他喜欢摩李着女人的缠足小脚来写作...这类逸闻曾随着一些通俗杂志为街头贩夫走卒所熟悉。辜鸿铭，几乎就是一个可笑与迂腐的代名词。

一直以来，辜鸿铭都令我非常困惑。辜并不是如一般的传统学者一样从小就在私塾先生的板子下接受了儒家典籍。他生在南洋，少年时受到的便是西化的教育，等到他从欧洲学成回到中国时，已将西方文化加以消化吸收。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了解爱默生就像一个美国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此外还略懂日语和俄语。

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成年之后突然对儒家学说迷恋至深呢?是什么触动了他的神经，让他逆那个时代渐起的“西化”潮流而动，从衣着到饮食，从思维到行为都完全中国化了呢?这种心理转变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只看到了后果:他不惜一切不遗余力地为中华文化辩护。

他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实际上，因为眼界开阔，这种不幸他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真实的阴暗会刺痛明眼人的双目。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你就离疯掉不远了。

也许辜为了不疯掉，只好装糊涂，只好以狂放来保护自己。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闻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是他的狂放姿态，是他带泪的出色表演，让我们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他翻译《论语》介绍给西方，想籍此宣扬儒学的深厚、成熟与文明。他在给北大学生上课时，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救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这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可他心灵的苦痛是掩饰不住的，他面临的困惑一样冰冷而坚硬曾经那么优秀的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面前自信全无，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暗夜里的这种苦痛追问，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此时此刻，它依然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近百年前，辜鸿铭梳着小辨走进北京大学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辨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这是为人所诟病处。可有谁注意过，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的。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历史可能已经证明他主张皇权是错的。可在当时，他却足以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保留皇权，并不等于拒绝现代化。消灭皇权，也不等于就自动实现了民主。中国的皇帝被打到了，可是那些参与打倒了皇权的人之后又干了些什么呢?复辟，内战，再复辟，再内战。没有了皇帝，中国就陷入了人人都想用枪杆子争当皇帝的混乱局面人人争当皇帝，受苦的只有百姓，受破坏的永远都是小民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那么点社会财富。

这就是辜鸿铭的痛苦所在。人人都说皇权坏，可是共和的好处为什么总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呢?人人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我们走上富强的路就总是这样的步履维艰呢?这是任何一个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辜鸿铭一生都在寻找答案，用他的执著，用他的狂放这样一个老人，带着他的辩子还有他无以言说的苦痛，在二十世纪初叶走了。我们可以哭，可以笑，之后，我们不该忘记的，还有一点理解，以及尊敬。